

苏东坡和杭州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目 录

人民诗人苏东坡	1
救灾赈民为杭人	9
我在钱塘拓湖绿	21
政虽无术心在民	43
最难忘苏公判牍	55
写尽西湖天下景	65
遗爱西湖传佳话	96
长留学士住西湖	121

人民诗人苏东坡

提起北宋大诗人苏东坡，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

苏东坡，名轼，字子瞻，东坡是他的号。北宋景祐三年（公元一〇三六年）十二月，出生于四川眉州（今四川省眉山县）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书香人家，他从小在“门前万竿竹，堂上四库书”的环境里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。他除读书作文外，还爱好书法、绘画。青少年时，熟读经史，纵论古今，胸怀壮志，一心想为国家建立功业。

但是，当时正值北宋中期，整个社会面临严重危机，外有辽、西夏的军事侵扰，内因国

家机构庞大繁冗，致使财政亏虚。苏东坡二十二岁（嘉祐三年，公元一〇五八年）中进士，正逢“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”，要求变法改革的高潮。就在这一年，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了“万言书”，提出变法纲领。所以苏东坡一踏上政治舞台，就面临一场改革与反改革的尖锐斗争。熙宁二年（公元一〇六九年），年青的宋神宗即位不久，他竭力主张革新朝政，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第二年又升他为宰相。在王安石主持下，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变法运动。

王安石变法初期，苏东坡站在反对的立场上。他曾两次上书神宗皇帝，全面非难新法，引起变法派的不满。熙宁四年（公元一〇七一年），苏东坡怀着“眼看时事力难任，贪恋君恩退未能”的矛盾心情，被贬到杭州任通判。但苏东坡与顽固派不同，在杭州期间，他看到新法对促进生产和减轻百姓负担有好处，就放弃成见，贯彻新法。但在执行新法过程中，他看到新法的弊病和短处时，又对新法进行了

抨击。

元丰八年（公元一〇八五年），宋神宗病死，哲宗继位。苏东坡因与那些顽固反对新法的人不一样，所以当司马光等反对变法的一派上台执政，废除新法时，苏东坡反而同他们唱对台戏了。他蔑视“变志易守，以求进取”，放弃了可以提升的机会，断然拒绝司马光的拉拢，在《与滕达道书》中明确地宣言：“今圣德日新，众化大成（指新法已经给百姓带来好处）……，若谄谄（争辩）不已，则忧患愈深。”并指斥顽固派“专欲变熙宁之法，不复较量利害，参用所长”的骄横无理，连呼“司马牛！司马牛！”结果，苏东坡又遭贬逐，于元祐四年（公元一〇八九年）第二次到杭州，任知州。

苏东坡虽在政治上有保守的倾向，但他不是谄媚权贵，一味向上爬的政客，而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官吏。王安石退隐以后，苏东坡反而有“从公已觉十年迟”的感叹了。难怪宋高宗

追谥他为文忠，特赠太师，还亲自为《苏轼文集》作序作赞，称赞他说“忠言谏论，立朝大节，一时廷臣，无出其右。负其豪气，志在行其所学；放浪岭海，文不少衰。”

苏东坡一生的道路，是坎坷不平的。他曾遭遇北宋最有名的文字狱“乌台诗案”，一时间“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”，险些沉冤狱底。他先后被放逐到密州、徐州、黄州、定州、惠州、儋州等地，过着“北船不到米如珠，醉饱萧条半月无”，“遗我吉贝布，海风今岁寒”的凄苦生活。长期的颠沛流离生活，使他更有机会接近人民，亲眼看到人民的疾苦，了解他们的要求，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。如抢救徐州水灾，保全了一州人民的生命财产；开浚杭州、颍州、惠州西湖，既灌溉农田，又美化湖山。他还用笔直接为人民说话：《除夜直都厅题壁》的哀囚徒；《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》中讽刺官吏；《吴中田妇叹》中写赋税甚于天灾，逼得农妇跳水自杀，作“河伯

妇”；《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》写杏花村里处处是“县吏催钱夜打门”；《异鹊》则抨击说，酷吏所至，“鬼车”就到，灾害跟来；《荔支叹》的宫中一声笑，民间千载血，更是锋芒直指北宋皇朝的统治者。

苏东坡还用诗人彩色的画笔，敷染过“照溪画眉渡溪去”的于潜女（《于潜女》）；“口吹葱叶送迎翁”的儿童（《被酒独行，遍至子云、威、徽、先觉四黎之舍》）；“酒无多少醉为期”，一个出鱼，一个出酒，“彼此不论钱数”的渔人和酒家（《渔父》）等等劳动人民的可爱形象。抒发过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（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）和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（《水调歌头》）的情怀，表达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挚爱。

苏东坡在诗、词、散文、书法、绘画等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颇有革新精神，取得非凡的成就。他的诗，内容丰富，境界开阔，格调清新，与黄庭坚一起被并称“苏黄”；他的词，

一洗五代以来绮丽柔靡的词风，开豪放词之先河，并提高了婉约词的境界，对后世影响很大，与辛弃疾齐名称为“苏辛”；他的散文，风格平易自然，议论则雄辩滔滔，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；他是文人画的开创者；至于他的书法，在宋代四大书法名家苏（轼）、黄（庭坚）、米（芾）、蔡襄（一说蔡京）中，也名列前茅。

象苏东坡这样在诗、词、散文、书法、绘画等各方面都有巨大贡献的文学家，在我国文坛上是不多见的。

苏东坡曾在杭州两次做过地方官，为杭州地方史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。苏东坡第一次来杭时是三十六岁，三年后移知密州（今山东诸城）。他在《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》诗中曾说：“推挤不去已三年，鱼鸟依然笑我顽。”十五年后，已五十四岁的苏东坡再次出仕杭州，元祐六年（公元一〇九一年）三月，再度离杭。苏东坡两次在杭任职，先后共五年。这

短短五年中，他朝夕与西湖相处，对杭州的山山水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他在《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》一诗中，曾这样说：“居杭积五岁，自忆本杭人。故乡归无家，欲买西湖邻。”苏东坡已把杭州作为他的第二故乡了。

苏东坡与杭州西湖似有“前缘”，他在《答陈师仲书》中说：“在杭州尝游寿星院，入门便悟曾到，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。”在《和张子野见寄》三绝中一首《过旧游》中又说：“前生我已到杭州，到处长如到旧游。”苏东坡离开杭州后，仍对西湖念念不忘，时常梦见西湖。他在《答陈师仲书》中这样说：

“轼于钱塘人有何恩意，而其人至今见念？而轼亦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，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。”他在诗词中也一再记述梦游西湖之事。《杭州故人信至齐安》诗中说：“昨夜风月清，梦到西湖上。”在另一首《次韵杭人裴维甫》中又写道：“寄谢西湖归风月，故应时许梦中游。”

苏东坡晚年从儋州归来，因四川遥远，归去不便，打算住在常州。他认为常州与杭州不远，时时可以去游览西湖，以作娱老之计。然而不意竟在常州一病而逝。苏东坡生前表示死后愿葬在杭州。他在《喜刘景文至》一诗中，曾说过：“平生所乐在吴会，老死欲葬杭与苏。”可见苏东坡对杭州感情之深。

杭州和西湖使苏东坡倾倒，使他摆脱了政治上的烦恼。而“杭州巨美，得苏白而益彰”。苏东坡在杭时的政绩和为西湖写下的许多不朽诗篇，给杭州和西湖添色增辉。

救灾赈民为杭人

苏东坡两次出仕杭州时，都恰逢杭州遭遇天灾与人祸的双重侵袭。他亲眼目睹广大劳动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，不仅以父母官的身份，竭己之力，解民于倒悬，为父老们做了些消除旱涝蝗祸的有益工作，而且站在诗人的正义立场上，为人民的痛苦大声疾呼。

苏东坡第一次遭贬，任杭州通判。通判与知州、知府一样，由中央直接任命，并带有中央官衔，与知州、知府共同处理一州政务。

苏东坡来杭的这年春夏之交，杭州连下十天大雨，河道浅塞，山洪暴发，各地几乎成了泽国。入秋又一个月不下雨，田地龟裂，禾苗

枯死。正如苏东坡在《祈雨吴山》一文中所说，“止水之祷未能逾月，又以旱告矣。”苏东坡作为杭州地方的父母官，常常应父老的恳求，亲自到吴山龙王庙、西山龙井寺、余杭径山寺、湖州黄龙宫等地去为民祈雨。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，又同样遇到严重自然灾害。冬春水涝，早稻没有种下去。水退后，晚稻又遭到旱灾。早晚两季稻都受到损失，“民之艰食，无甚今岁”。杭州一带都是水乡，很少种麦，一直要到第二年夏天才有收成，而次年收成如何，又很难断定。苏东坡“深恐明年春夏之交必有饥馑盗贼之忧”，因为熙宁八年（公元一〇七五年）浙西曾闹过一次灾荒，当时“人死大半，至今城市寂寥”。为防止这种惨祸的再现，苏东坡上书朝廷，请求缓交本路上供米的一部分。

杭州的官舍，自五代吴越王钱镠修建以来，百余年未曾整修。苏东坡通判杭州时，这些官舍已有倒塌的危险。他第二次来杭时，房

屋部分倒塌，压死压伤多人，他请求朝廷赐度牒（僧尼出家，官给凭书，可免赋役，叫做度牒。元丰年间规定，每道度牒百三十千钱）二百道修葺杭州官舍。一〇九〇年春，苏东坡看到灾情越来越严重，就把修理官舍的这笔钱，先用来买米赈济饥民。另一方面，由于苏东坡反复奏议请求，朝廷决定拨本路上供米二十万石赈饥，宽减元祐四年上供米三分之一。杭州和浙西米价逐渐降落，这一年春天没有饿死一个人。

但是，有些地方官吏不把人民疾苦放在心上，一味向上献媚，看到这年春天没有饿死人，就立即报告朝廷，声称本年丰收，别无流民，要求收回度牒钱粮。苏东坡就在《奏户部拘收度牒状》中反驳道：“去岁灾伤之甚，行路备知，即使今岁秋谷大稔，犹恐未补疮痍，而况春夏之交，稻禾未了，未委逐路提转（提刑转运官），如何见得今年秋熟，便申丰稔？”五六月间，果然浙西数郡大雨不止，太湖泛

滥，庄稼遭淹。六七月份米价再次上涨，“民之穷苦，实倍去岁”。即使这样的灾情，一些地方官仍忌讳言灾。苏东坡却接连多次向父老了解灾情，向朝廷报告受灾情况，要求宽减本路上供米，并高价收购粮食，以备来年出巢救饥。

苏东坡在《奏浙西灾伤第七状》中总结这次在杭州的救灾经验时说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败。如熙宁八年遇灾，地方官吏没有及时奏闻朝廷，不先作救灾准备，灾疫发生后，朝廷才知道，命令以江西及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万石救灾，结果无济于事，杭州地区饿死的人达五十多万，苏州地区也饿死三十多万，弄得“城市萧条，田野丘墟”。这是“不先处置之过”。而这次水旱灾害不亚于熙宁八年，由于粮食作好贮藏，米价并未暴涨；救济医治及时，人免流殍；然而朝廷所费钱粮只是熙宁八年的六分之一。这是“事先处置之力”。足见苏东坡为民考虑周到，治政有方。

杭州一带，除水旱灾害外，蝗虫的祸害也十分严重。苏东坡首次来杭州时，曾亲眼看到蝗虫自西北飞来，声乱如浙江之涛，上遮日月，下掩草木，飞蝗所过，赤地一片，颗粒无收，正如他在《戏毛国华长官》一诗中所说：

“宦游逢此岁年恶，飞蝗来时半天黑。”当时一些地方官吏，为取悦朝廷，竟隐瞒蝗灾。苏东坡却不顾劳累，常常为跟踪蝗虫、检查捕蝗工作，北上镇江、无锡，南行至新登、富阳山区。他在《捕蝗至浮云岭，山行疲苦，有怀子由弟》一诗中写道：

西来烟阵塞空虚，
洒遍秋田雨不如。
新法清平那有此，
老生穷苦自招渠。
无人可诉乌衔肉，
忆弟难凭犬寄书。
自笑迂疏皆此类，
区区犹欲理蝗余。



诗中一二句描写蝗灾严重，蝗虫落地比雨点还密。三四句是讽刺当时某些官吏为了附和新法，否认蝗灾，所以他只好承认是自己招惹来的。最后，诗人虽然感到无人可诉，但还是竭尽全力治理蝗灾。“区区犹欲理蝗余”，正是苏东坡一心为人民的可贵之处。

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，老百姓还要负担很重的徭役。一〇七二年秋，盐官要在杭州一带开运盐河，苏东坡认为开运盐河有碍农业生产。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，反而派他去汤村督役。这次开运盐河，正巧碰上大雨，河床中又遇流沙数里，民伕在泥泞中冒雨劳作，疲惫不堪。苏东坡在《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》中描写道：

盐事星火急，谁能恤农耕？

薨薨晓鼓动，万指罗沟坑。

天雨助官政，泫然淋衣缨。

人如鸭与猪，投泥相溅惊。

寒冬季节来临后，看到一千多劳动者在荒